

龚育之
著

党史札记

末编



人民
出版
社

龚育之
著

党史札记

末编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党史札记

-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 / 3
- 关于《陈独秀往事》致靳树鹏先生 / 10
- 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 / 17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 / 23
- 访龚育之教授
- 在刘少奇《论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33
- 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所想到的 / 40
- 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 4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 51
- 写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前面 / 57
- 漫谈口述历史 / 61
- 祝于光远九十寿 / 66
-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 74
- 夏明翰精神不朽 / 90
- 《感受西柏坡》序 / 93
-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 97
- 建议编《胡（耀邦）选》 / 132
- 回忆：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 / 135

未
编



《学哲学 用哲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 141

《百年潮》创业三君子 / 144

——为《〈百年潮〉精品系列》出版而作

在《百年潮》精品系列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 149

从党史看洛峰 / 152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 / 158

在《郑必坚论集》座谈会上的发言 / 211

在《山高水长》座谈会上的发言 / 216

《如火如荼话周扬》序 / 220

《何祚庥科学思想言论集》序 / 226

《宋贵伦论文集》序 / 230

一个让读者更多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 / 233

一个希望 / 238

——在《竺可桢全集》(一至四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的第三个上级 / 242

——于光远素描

回顾:五年和八十年 / 256

往事琐忆及其他

旧游琐忆 / 299

我在清华的三年 / 302

干校探亲琐忆 / 327

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 338

物理,永恒的辉煌 / 346

编后记 / 349

党史札记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都勿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龚育之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

近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要我开一张二〇〇四年的读书单,十本左右,有的可以略加介绍和评论,文字要短,总计在千字以内。写完文稿,觉得意犹未尽。那个书单,是从这一年所读的新出的书中挑选出来的。这一年我还读过一些其他的新出的书,以及一些几年前出的书。有些不必或不便提及,有的还是值得一提。至于评介,也还可以稍加补充。经这两方面补充之后,就把它作为《二集》出版后党史札记专栏的新的一篇,交《学习时报》发表。书单中的书,大多是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党史有关的。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冷溶、汪作玲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继《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之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又一部力作。我是在出版之前读到此书的清样的。请不要把这部书当作“官方”的没有学术价值的“某种‘宣传品’”(胡乔木语)而置之不顾。这是一部因为有“官方”的便利条件而在档案的运用方面拥有极大优势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者不可不读,不可不细读,不可不反复查阅。

举三个例子:

例一,《年谱》记载: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 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

未
编



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原来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谈对立的统一》等六篇稿子，需要重新整理。”

“其他整理稿，再对照毛主席讲话记录原稿阅读，如有必要时，也可作一些文字上的调整。还要阅读毛主席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讲话等，有的还可考虑编进去，如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信中还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进行。

这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极重要的文献。我当时参加过一段编辑工作，知道有这个文件但是没有见到过，所以在写《忆往：读毛与编毛》时，这一段没有写得很清楚。读了这一条材料以后，对陈伯达参与编毛选第五卷的情况，后来对他主持的某些篇的编辑工作予以重新整理的过程，以及那时即已考虑毛选第六卷选目的事情，就比过去弄得更清楚了。

例二，《年谱》记载：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 审阅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送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改草案》。将《修改草案》第三条中的“中国工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语，改为“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注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章程、法律这类性质的文件，以不写个人为宜，故在第三条作了一点修改。”之后，华国锋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所提修改意见。”

这是一条我完全不知道的材料。读到这条材料，我觉得很重要，便记了下来，以备适当时候引用。终于在写《党史札记二集》后记时，补充引用了。

记得在邓作这个批示之前，在讨论十一大党章和一九七八年宪法草案的时候，都有人提议要写上英明领袖的名字，当然都没有被采纳。

例三，《年谱》记载：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我参加过这个文件的起草,知道这个情况,但没有见过这个文件和邓对它的批语。

这三例说明:《邓小平年谱》中这类首次公开发表的重要史料,的确确是不少的。

《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这是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以胡为首的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二十四次谈话的记录和说明。它的基础是档案,包括政治研究室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揭发”和“交代”的档案,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中的档案。有了这份《二十四次谈话》,《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年中的这一部分就显著地丰满起来了。由此想到,如果有关单位、有关人员都能这样,把档案,把回忆,充分地发掘出来,写出可供别的研究者使用的历史资料,那么,《邓小平年谱》这一类的著作,就可以全面地丰满起来,从而避免有详有略甚至有详有缺的情况。

这部书后面附录了当年政治研究室主持或参与起草的三个文件草案的全文。这三个草案,在“批邓”中被诬为“三株大毒草”。“四人帮”批判这“三株大毒草”的文章,被分别印成三本小册子,广泛发行,每本后面都附录了被批判的文件草案。但那些附录,不知是从什么途径弄到的,文本很不完整很不准确,有的只摘录了一些部分。这次出这

末
编



本《二十四次谈话》，附录这三个文件草案，用的是完整准确的文本。其中《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前后有六次稿，前三次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是胡耀邦主持起草和修改的；后三稿改了题目，是在胡耀邦稿的基础上邓小平交由政治研究室胡乔木主持修改的。拿到国务院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的稿子，是胡乔木主持修改的第一稿；修改后由邓报送毛泽东的是其后的第二稿；再修改后报送邓小平的是这之后的第三稿，这第三稿邓没有再送毛。现在这本书里选的是由邓报送毛的那一稿，我认为这个选择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在邓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印发、经修改后又由邓报送了毛的稿子。毛看到并有所批评的就是这次稿子。不过，“批邓”时所印小册子，附录的却不是这一稿，而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部分摘录。因此，我认为，如果同时附上胡耀邦主持起草和修改的那个汇报提纲的第三稿，就更合理了。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吴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批判彭真后改组新建的北京市委的负责人，结束时是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的政治局委员，所以说，他是自始至终居高位的一位领导人。由他口述写出的这部回忆录，有特别高的史料价值。

回忆录难免有这样那样有意无意的失误或不完全属实的地方。怎么办？我以为，回忆录多了，各种人都写了，就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参证，互相补充和互相纠正，就能更好地展现出历史的真相，总结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近《当代中国史研究》刊载了谢静宜对吴德所述一项事实的更正，就证明了我的这个看法。

王蒙：《青狐》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季节》系列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季节》的又一续作。《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

《狂欢的季节》，这四部书构成一个系列，是小说，不是历史，不是回忆录。但却包含着王蒙从地下时期的不够年龄的小共产党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热情奔放的共青团干部，从反右落网到右派改造，从回城后短暂的安静到又一次暴风雨欲来，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这四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历史与王蒙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是不是也可以说该书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带有个人回忆性质的历史作品呢？

至于《青狐》，比起《季节》系列来，那就更是小说而远离回忆录了。但王蒙最近评论顾骧的《晚年周扬》，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悲情的思想者》。其中说道：顾骧此书披露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周扬的一些思索、遭遇和那个年代对文艺工作的讨论等内部材料。“恰恰在近日出版了拙作长篇小说《青狐》，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题材，与这本书的题材重叠或者交错，有的段落可以互为验证，互为补充，互为演绎。”这就印证了我的说法：《青狐》是《季节》系列的某种延伸，是更多艺术虚构成分的历史和回忆。

不过，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还是更愿意读丛维熙所写的《走向混沌》那样的作品。当然，我不知道《走向混沌》里有没有或有多少离开回忆的真实性而具有小说的虚构性的成分。

聂华苓：《三生三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大陆的经历（抗战时期的流亡）为一世，在台湾的经历（卷入雷震《自由中国》一案）为一世，在美国的经历为一世。同美国作家安格尔结婚，在美国爱荷华州安居的那一世，大概是作者生活最安定、最幸福的一世。可我作为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前面那两世，大概是那两世同我们的生活更近，所经历的风雨我们也感同身受或者似同身受的缘故吧。

沈君山：《浮生三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古人沈复写过一本《浮生六记》，今人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桥牌和围棋高手），又写了这本《浮生三记》。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位沈

未
编

之
著
育

君山先生,还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过“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主张。说明中华祖国儿女,在感情深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在三〇一医院治疗中风后遗症时,得知邓小平最后也住在这所医院,作为康复治疗的一种练习,他每天爬一层楼到邓小平住过的房间去“瞻仰”一番。

杜高:《又见昨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李辉:《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剧作家,一个经过十多年劳改的“右派分子”、“胡风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改正,得到平反,重新融入社会,担任领导职务。此人就是杜高。忽然有一天得知,本以为已经销毁或者应该密藏的他的右派档案、胡风一案档案、劳改档案,被人在潘家园旧物市场上购到。这购者就是李辉。如果你是当事人,会作何感想?作何反应?这就是《又见昨天》和《一纸苍凉》两书从不同角度所写的同一件遭遇。同意发现者把这些档案公开出版,表现了杜高极高的思想境界。

高勇:《胡耀邦主政团中央》 中华儿女出版社

曾任胡耀邦秘书的作者,对胡耀邦的近距离观察。书名“主政团中央”,写的是胡耀邦从到团中央以后一生的主要经历,包括他的浮和沉,死和葬。

《黄慕兰自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长期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传奇经历。她入党后的第一任丈夫宛希俨壮烈牺牲了,第二任丈夫贺昌去了苏区(后来也牺牲了),而她则留在白区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因“世家小姐”的身份,结识大律师陈志皋,得陈之助最先获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而报告了党中央,得陈之助在敌人登出造谣的《伍豪启事》之后,为周恩来登出辟谣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与陈结婚以后,

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她与陈曾被军统逮捕而在法庭慷慨陈词。上海解放后,党籍不被承认,并因潘、扬冤案而被牵连入狱。连在地下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见天日。

《蒋廷黻回忆录》 岳麓书社

这是我做白内障手术期间请人帮我朗读的一本书。同那些拿庚款留学的人们不一样,这位口述者是民国初年凭在湖南的美国传教士的一封信自费赴美、勤工俭学的留学生,那经历是相当艰苦的。举一个例:他到那勤工俭学的中学报到,当即被派到牲口棚牵一匹骡子到车站去为学校拉煤,而对他这位湖南少爷来说,赶车拉煤的事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留学十年回国,先教书,后从政。从政的经历没有口述完就逝世了,可见回忆录的写作对年纪老的人来说,要及早动手。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唐宝林:《求真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为了查一点材料,粗看了这本《中国托派史》。正如封三的简介,此书以翻阅了难得的档案见长,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既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路线,在夹攻中不断分裂,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投降国民党当了特务,有的受尽图囿之苦而始终不悔……

作者把此书寄给尚存的托派元老,请他们就历史事实有无出入提出意见,受到从托派观点而来的否定和指责。为回答这些指责,作者写了一篇长文《就〈中国托派史〉致郑超麟及其托派朋友们的公开信》,收在《求真集》中。这种事实论(以事实为基础,观点从事实而来)和观点论(以观点为统帅,事实服从观点)的争论,很值得一读,很值得一想。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学习时报》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

末
编



关于《陈独秀往事》致 靳树鹏先生

树鹏先生：

收到来信。

《陈独秀诗集》当在复印后将原本寄回。

《陈独秀往事》清样已拜读。你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搜集陈独秀的著作和相关材料，追寻陈独秀的遗踪，访问陈独秀的旧交，写出了这样一本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生动流畅的著作。你谦称自己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在这样一个专题上，你比许多专业工作者（比如我）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我为你的这本著作的将要出版而向你祝贺。

萧克老人为《陈独秀诗集》所写的序言，其实是一篇要求史学界“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纲领。我觉得把它移到你这本书的前面作为代序，很合适。萧老说：“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该包括搞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这是从政治上研究陈独秀的主要问题。萧老还说：“对陈独秀的研究，不仅限于他在政治方面，当然还应有其他方面。”陈独秀的诗，他认为就是一个方面。他这篇主张“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序言，是一顶大帽子戴在一个小头（《陈独秀诗集》）上，现在把

它移到一个较大的头(《陈独秀往事》)上,不是很合适甚至更合适吗?

当然,你也没有企图在这本《陈独秀往事》中“全面地研究陈独秀”。你的笔触,集中在记述陈独秀青春年代的奔走,五四时期的英姿,晚年岁月的凄苦,他的家庭、他的婚恋、他的儿孙,他的朋友、他的同志、他的学生,他的诗篇、他的书法、他的字学……对萧老提出的“七大问题”,你或者没有涉及,或者有所涉及也是“散文式”的、“边缘性”的。那些政治方面的问题,需要详尽的论据、展开的论证、反复的斟酌,即需要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才能说得比较清楚,不是“随感式”的文章可以胜任的。你不去正面论述那些问题,只侧面涉及,我看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选择。

至于你要我也写个序,在读了你的书稿之后,我更缺乏勇气了。你说,“重新研究评价陈独秀的思潮已经涌动二十多年,著作几十种,文章不可胜计”。而我呢,这些著作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著作选》各三大册,我虽然购买了,放在我的书架上了,也只选读过若干篇,没有通读过。没有研究,我没有发言权啊。

来信希望我对你的书稿清样提意见,我一边读一边记下一些被我发现的残留的错字,算是做个“义务校对”吧(都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又记下一些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算是做个“义务责编”吧(也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分散发表、汇编成集的书,重复的地方不可免,但重复过多还是不可取。来信说,你还在删削重复上下工夫,这很必要。附录这一部分,比较零乱散杂,性格不甚明确,建议加以精简(此点也已采纳——靳注)。

除此之外,这封信主要想同你讨论、请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鲁迅答托派的信。

一九三六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鲁迅写信,大约是听到某些传闻,以为鲁迅同中国共产党有了矛盾,可能会支持托派的观点,才把托派的宣传品寄给他的。信里集中攻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

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策,尤其是现时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攻击的谬误和狂悖,当时在托派以外的人看来已很显然,现在更是被历史所完全地证明了。鲁迅收到信,很生气,在重病中无力写信,就由刚从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为其起草了这封答托派的信。从回信本身来看,信中只是作出了托派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攻击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政策,“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信中的确说了:“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但接着就说:“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根据这些话,把诬陷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拿日本人钱的汉奸的罪名,加到鲁迅头上,说鲁迅是始作俑者,恐怕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就是加到冯雪峰头上,恐怕也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

陈独秀是主张抗日的。别的不说,一九三四年在狱中的组诗《金粉泪》,就洋溢着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悲情。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从狱中出来,明确表示赞成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一九四〇年他写信同他从前的托派友人西流等争论,批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同鲁迅答托派的信所用的逻辑一样,陈独秀在这里也只是作出了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而没有理由说陈独秀指控某人为日本奸细。

你引用了王观泉先生的文章《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文的贡献,在于查出《救国时报》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就鲁迅答托派的信,发表过诬托陈派为日寇奸细的伍平通讯和报纸社论。比别的文章把此事追究到康生一九三八年初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为止,追溯得更早、更深。但是,《救国时报》上那篇通讯和社论,引用了

鲁迅那封信,却不能说是严谨地遵照它的原意,而是引申了它的原意。文中说:“先生毕竟还是出语忠厚”。从而略去了鲁迅的“忠厚”之语不引,却举出据说是“中国托派”张慕陶等事例,说其实“这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千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这表明作者自己知道,他引用鲁迅,是加了码的,不但分寸上加了码,性质上也加了码。

我请韩钢同志帮我查了一下《救国时报》,发现确如王观泉所说,伍平通讯把给鲁迅写信的陈××误认为可能就是陈独秀。伍平又说,“即令不是陈独秀,也是一位托陈派中重要人物,反正都是一样”。但是,伍平通讯并不是《救国时报》骂托陈派为汉奸的开始。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五月十日),《救国时报》就已发表过说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在这之后发表得就更是连篇累牍。《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底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康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办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两期的一万好几千字的洋洋大文,前一半说苏联托派为德日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材料都是引用斯大林和苏联反托大审判;后一半说中国托派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相当一部分材料同《救国时报》上的材料相同。文中提到鲁迅那封信,只用了半句话(“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这里直指陈独秀,可能沿袭了伍平把陈××误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回国的王明、康生为什么那么猛烈地发动反托陈派“汉奸”的舆论攻势?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挟苏联反托正紧之威,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国内的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一定原则条件下接受和联合陈独秀一事,置于被动的地位。这一点,许多研究文章已经指明。

陈独秀的汉奸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已经为他洗刷了。这些诬陷从何而来?源头恐怕还要从苏联方面反托的材料中去找。一九八八年苏联最后为诬指托洛茨基派为德日匪谍一案平了反。但在三十年代,却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各国党认定的铁案。前面提到康生文章,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反托是自王明、康生回国才开始。自从陈独秀同

末
编

之
著